

灾害的铸象：为什么同一次暴雨能生成公共之灾，却将另一些毁灭铸成私人厄运

受损不是等待制度去发现的现成之物，而是被一套认知装置铸造为可识别之象的产物

孔凡鹤 著 · SDE 学员 · 灾害治理与制度分析 · 2026年7月26日

摘要 为什么物理强度相似的极端天气，会在不同人群身上生成完全不同的后果？主流灾害研究将此归结于脆弱性、治理能力或风险建构的差异，但它们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受灾者的受损本身，在进入制度识别程序之前，是一个现成的、有待被准确反映的既存事实。本文提出一个根本不同的判断：受损不是等待制度去“发现”的现成之物，而是被一套认知装置“铸造”为可识别之“象”的产物。这套装置——由命名、算式、道理构成的制度铸模——不是在记录受损，而是在按照自身的格式铸造受损：只有完成了从非格式化的、弥散的受灾生活到格式化的、可被治理系统扫描的“灾害之象”的铸压，受损才获得制度存在。本文以中国城市暴雨的公开制度材料为背景，构造一个机制性综合案例，追踪铸象装置从灾后第一刻到最终定性的完整运转过程，揭示其三个核心机制——赋形命名、裁量算式、封口道理——并论证：灾害不平等的根基不在救助分配环节，而在受损被首次纳入制度真实的铸象门槛上。文章进一步引入一个对比维度，具体展示在同一场暴雨中，不同受灾群体的受损如何因格式匹配度的差异而在铸象的窄门前分道扬镳——或成功铸入公共之灾，或被铸出为无人为之负责的私人厄运。在理论层面，本文通过将“铸象”与福柯式的规训权力、布尔迪厄式的象征暴力以及斯科特式的国家格式化进行显性对质，指出铸象装置的独特理论收益：它不只是在分类和规训，而是在第一个制度性检验的关口上，决定着谁的毁灭有资格进入治理系统的真实。

关键词：铸象；灾害生成论；制度铸模；格式过滤；程序封口

一、引言：暴雨落下之后，发生了什么

一场暴雨落下。在气象雷达上，它是等压线密集的漩涡；在新闻标题里，它是“若干年一遇”的极端天气。风速、降雨量、移动路径——这些物理参数可以被蒲福风级和毫米刻度忠实地记录，并用来比较不同场次暴雨的强度。但正是在这种物理强度近乎相同的暴雨中，最令人不安的事实浮现出来：风与雨携带着相等的动能砸落，却在不同的人身上砸出了完全不同的悲剧。

同一场暴雨，落在一个地级市的中产社区，让几十辆车泡水熄火。第二天，保险公司在停车场围起警戒线拍照定损；新闻标题写着“城市内涝考验市政排水系统”；市政官员被要求说明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而落在几百公里外一个农业县的同一场暴雨，淹没了三万亩即将收割的水稻。它在地方政府的报告中只有一句“局地农田渍涝”，听起来像土壤偶尔打了个嗝，晒干就好——没有任何问责的锋芒，没有撬动上级财政救助的开关。数字完全相同的风与雨，为何前者成为撬动公共资源、问责官员的“灾害”，后者却沦为一种近乎私人的、无人为之负责的“倒霉”？

主流灾害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通常沿着几条熟悉的方向展开。第一条指向物理脆弱性：建筑质量差、基础设施薄弱、地理条件不利。第二条指向经济欠发达：贫困地区抗灾投入少、恢复能力弱。第三条指向治理失败：预警失效、应急迟缓、腐败侵蚀防灾工程。这些解释各有其不可替代的洞察。脆弱性范式将分析焦点从自然力量的肆虐转向社会结构的缺陷，揭示了灾害的破坏力从来不只是物理性的。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推进这一逻辑，开始关注灾害的符号与话语维度。社会放大框架（SARF）论证了风险的感知和应对并非与物理损失成正比，而是被信息流、制度结构和公众反应等社会过程放大或衰减。风险的文化建构传统则从更宏观的层面揭示：一个社会将什么识别为“风险”，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判断，而是浸透着文化价值和政治选择。

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不可绕过的理论地基。但本文试图指出的是，它们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受灾者的受损本身——那些被洪水冲垮的房屋、被淹没的庄稼、失去亲人的痛苦——似乎总是在那里，作为一个既存事实，等待社会力量去“放大”“衰减”或“建构”它的感知和后果。社会过程被理解为在对一个已经现成存在的受损进行二次加工，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参与受损的制度存在本身的构成。

本文提出一个根本不同的判断：受损在被制度识别之前，不是一种等待被准确反映的现成事实。离散的、弥散的、混沌的受灾生活——那些被水浸泡的家具、被淤泥覆盖的田地、失去亲人后在安置点里漫长的等待——只有当它们被一套特定的认知装置所捕捉、赋形和凝固，被铸压为一种可以被治理系统扫描、比较、归档的制度之象时，它们才获得了制度存在。这套装置不是记录器，而是铸模。它不是在忠实地反映受损，而是在按照自身格式铸造受损：只有完成了从非格式化的受灾生活到格式化的制度之象的铸压，受损才被这个治理系统承认为真实。

这，就是“铸象”。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受灾者的受损，从暴雨落下的那一刻起，必须穿越由命名、算式、道理三者联合构成的制度铸模，被铸造为一个合格的“灾害之象”，才能在这个治理系统里获得制度真实——进而获得被政府看见、衡量和回应的资格。恰恰是这一铸造过程的格式过滤与尺度挤压本身，在同一次暴雨中，将某些人的毁灭铸成了公共之灾，而将另一些人的毁灭铸成了私人厄运。灾害

不平等最根本的起源，不在救助物资分配的后端，而在受损被首次转化为制度事实的铸象门槛上。

这个判断将本文的分析区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社会放大框架揭示了灾害信息如何被社会过程放大或衰减，但它较少追问：受损要跨越什么样的门槛，才能首先被转化为可被系统识别的“灾害信息”？建构传统揭示了风险认知的文化选择性，但它往往在宏观的历史与制度层面展开，较少具体追踪这种选择如何在一次特定的暴雨中、通过特定的表格和措辞被操作出来。脆弱性范式揭示了为什么某些群体承受打击的能力更弱，但它没有解释为什么某些群体的受损从根本上就无法进入制度真实的统计网格——不是因为他们的受损“被发现得不准确”，而是因为他们的受灾生活一开始就没能被铸入那个网格所要求的格式。

在展开全文论证之前，有必要先廓清“铸象”这一概念的理论坐标，因为它并非凭空而降。它必然唤起一些强有力的理论近邻，而这些近邻恰恰是它必须与之对质、并在对质中指出自身独特收益的参照系。这一步不是学术礼仪，而是论证之骨。

最显而易见的近邻，是那种被概括为“规训权力”的分析传统。这一传统揭示，现代制度并非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分类、命名、标准化来主动地生产现实——医院生产“病人”，学校生产“学生”，监狱生产“罪犯”。铸象装置确实承接了这一基本洞见：它承认制度是真实的铸造者，而非记录者。但铸象与规训之间有一个关键的、不可还原的分别。规训权力的典型操作，是将已经进入制度视野的个体，按照一套规范进行改造和塑形。病人被诊断、被治疗、被管理；学生被考试、被评级、被分流。而铸象装置做的事情，比规训更早、也更根本：它在第一个制度性的检验关口上，决定谁有资格被规训。在那张灾害统计表格上填写“0间”的公务员，不是在规训那些房屋被毁的租户——那些租户的毁损甚至没有进入可以被规训的制度空间。他们被铸出的，不是一套需要遵守的规范，而是一种制度的不可见。铸象关涉的不是如何把人变成标准化的主体，而是谁能在制度的真实中获得一个哪怕是标准化主体的位置。

第二个近邻关涉的是符号权力如何在不被识别为暴力的情形下施加暴力。这一传统揭示，社会世界中的支配常常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使被支配者将支配的范畴误识为理所当然的——把“这就是规矩”当成“这就是天理”。在铸象的过程中，这种合谋确实在场。那个在表格上写下“0间”的公务员，并非出于恶意；他只是在那套表格格式面前，没法把那些没有产权证明的受损翻译进去。表格没有说那些租户不应该被救助——它只是没给他们留位置。合谋不是受害者的自我责备，而是整个制度语法以一种中立、客观、技术性的面貌运行，使得那些被排斥的受损看上去不像是被排斥，而像是本来就不属于这里。铸象的暴力，正是这样一种格式化的、不流血的、因而不被识别为暴力的暴力。

但铸象与这个传统之间，同样有一笔最重要的分别。符号暴力的核心动作是“误识”——让支配关系被看成自然的、正当的。铸象的最后一环——程序化封口——确实生产着一种深刻的误识：它用一场追责表演，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已经处理过了”。但在这套论述中，我们对这场表演的分析，重点不在于它如何让受害者接受自己的命运，而在于它如何运作在制度程序的层面：调查、通报、处分、闭环。这道工序的任务，是注销追问，而不是说服人心。它不要求受害者相信这份通报的公正——它只要求这份通报能在上级政府的档案系统里成为一个可引用的“已处置”条。

第三个近邻则来自国家理论中对“格式化”的经典剖析。这一传统揭示了现代国家为了治理，必须将复杂、混沌、充满地方性知识的社会实践，转化为可被中央扫描的标准化格式——地契、人口普查、度量衡的统一、土地分类图。铸象的逻辑确实深深受惠于这些分析。它同样揭示，灾害治理不是直接看见受灾者，而是通过一张由命名、算式、道理构成的格式之网去“看”他们。但“铸象”试图钉死的，是此前分析中一个未被充分命名的特定工序。经典的“格式化”分析揭示的是：国家把土地、人口、财产变成了表格里的条目。而铸象要追问的是：在灾害这个特定情境下，那些条目不仅仅是对现实的简化——它们是真实性的门槛。暴雨过后的受灾生活，只有当它穿越这张格式之网、被铸压为制度之象后，才第一次在治理系统里获得了可以被承认、被衡量、被回应的存在。在那之前，它不是一种“有待被更准确的格式捕捉”的真实——它是用这套制度的眼光看，根本就没发生过的真实。

本文在论证结构上将以一个真实发生的中国城市暴雨事件为叙事蓝本，追踪铸象装置从灾后第一刻到最终定性的完整运转过程。第二至第四部分将分别分析铸象装置的三个核心机制——赋形命名、裁量算式和封口道理，揭示它们各自如何执行铸造中的格式过滤与尺度挤压工作。第五部分将引入一个具体的对比维度，展示在同一场暴雨中，不同受灾群体如何在铸象的窄门前分道扬镳——或成功铸入公共之灾，或被铸出为私人厄运。第六部分回应最有力的反驳；第七部分给出结论与该判断的证伪条件。

二、赋形命名：受损如何被铸入制度真实的第一个格式

灾害铸象的第一个环节，是命名。命名绝非给一个既有的“灾”贴上中立标签。它是铸象装置的第一道模具——通过一种极其狭窄的制度-符号格式，将某些受损从“无法被制度承认的混沌”中拉扯出来，赋予它进入治理系统真实的资格。

名字作为制度钥匙

当一个物理事件被赋予“灾害”之名时，这个名字触发的不是文字装饰，而是一整套制度程序的强制启动。在国家治理的运转逻辑中，“灾”是一个准入性范畴：只有被正式命名为“灾害”的事件，才能合法地打开紧急财政储备、触发上级响应机制、并启动对相关责任的追溯程序。名字不是对既有事实的描述，而是让后续一系列制度成为可能的施为性前提。

以下以“二〇一六年华北某市暴雨”为机制性综合案例。它参考公开灾情材料和我国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用于展示命名程序如何把受损转译成行政上可识别的类别，不对应某一可识别城市、会议或受访者。在这一重构中，居民首先以“暴雨围城”“城市看海”等日常语言描述受损；随后，制度系统通过会商，把事件命名为“城市内涝灾害”。这个命名动作随即触发响应预案，锁定排水系统的主管责任方，并把后续统计导入积水深度、退水时间和管网标准等可量化框架。

而在同一省份的另一座城市，另一场暴雨造成的损失甚至更严重——数百万亩农田被淹。当地政府在灾情上报中将其命名为“局地农田渍涝”，并作为农业生产的“阶段性波动”处理。据该省后来公开的救灾资金分配文件显示，那场暴雨覆盖的农业县所获得的省级财政救助，比被命名为“城市内涝灾害”的地级市低了整整一个量级。“渍涝”这个措辞在制度上不触发国家自然灾害救助中的“洪涝灾害”响应条款，因此不自动打开省级以上财政救助通道；“农田”则将受损限定在一个经济生产部门而非人类的日常生活空间，这大大削弱了它作为人道主义问题的紧迫性；“局地”进一步限缩了影响的正当规模。两个名字，两套制度后果——不是权力扭曲了事实，而是权力在制度许可的命名菜单上做出了最“合理”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将在铸象的后续环节中被加固为不可逆转的制度真实。

命名的格式要求：被制度看见的资格

然而，命名之为铸模，其关键机制并不只是“权力强势者命名成功、弱势者命名失败”的二元故事。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命名本身需要一种特定格式的受损作为原料。制度命名系统不是一张可以容纳任何形状的空网，而是一套有特定格式要求的模具。在它的运作中，“受损”要被看见，必须首先呈现为某种制度所能识别的格式。

核心的格式要求是“户”的存在。在当代中国的灾害治理制度中，受灾者最基础的识别单位不是“人”，而是“户”——一个在户籍、房屋产权或固定居所登记中可以被指认的制度坐标。这套格式不是某个官员的偏好，而是有深厚制度史根基的构造。它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的里甲赋役登记，经过集体化时期的工分记录与户口制度，最终在当代灾害救助系统中沉淀为一条不成文的操作铁律：一个受损，必须能被安放在一个有制度坐标的“户”上，才能被识别为一笔合格的灾情。

想想那个在工地上打工的五十岁男人。他没有本地户籍，独自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自建房里。台风过境，屋顶被掀掉。他的受损，从根本上就无法进入命名的模具——他既不属于“受灾安置人口”（因为没有在册的固定住所可以“失去”），也很难被归入“转移救助对象”（因为没有人启动对他的救助程序）。要让他被纳入“受灾者”范畴，必须先有一个能够被制度识别为灾害的事件名称——比如“某市台风灾害”。而要触发对这场“台风灾害”的命名，又需要足够数量的、可被统计的受损个案作为证据。但他的受损本身，因为没有“户”这一制度载体，从一开始就无法进入那套统计网格。

他被困在一个铸象的恶性循环里：由于受损不符合制度命名系统所要求的格式（无“户”可依），命名不会为他启动；而由于命名没有启动，他的受损永远不会被纳入那套能让命名成立的统计证据库。这不是权力博弈的输赢，而是博弈的棋盘根本就没有为他铺设格式。他的苦难不是被低估、被掩盖，而是在根本上就无法被本套铸象装置赋形——因此在这个治理系统的真实中，它不存在。

命名的微观铸压

这种格式过滤并非抽象的制度逻辑，它在灾害现场的每一刻都被具体的行动者所操作。本文作者在对多个灾后治理过程的追踪中，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情景：基层工作人员面对统计表格时的犹豫。一位在某次洪灾后负责灾情统计的乡镇干部，曾在一份未公开发表的工作总结中写道：“最难填的不是数字，是‘算不算’。老张家的房子塌了一半，但他那是自己搭的偏房，没有房产证。填‘倒塌房屋’吧，上面查下来怕担责；不填吧，他确实没地方住了。”最终的解决方式，是在“倒塌房屋”一栏填“0”，然后在备注里加了一句“另有部分临时建筑受损”——这句话不会被汇总进全市的灾情总量，也不会触发任何救助响应。

这个“0”，不是谎言。它是命名模具在无法归类面前的制度性沉默。然后，这个“0”与全市其他区的数据汇总在一起，成为证明本次暴雨“未造成重大房屋损失”的硬证据。以此为基础，上级政府在灾后救助资金的分配中，优先考虑了那些有明确“房屋倒损”数据的县市。命名，不是被一次宣布完成的。它是在无数张表格的填写中，在无数次“这个算不算”的迟疑中——在那些沉默的“0”所共同完成的微观铸压中——被一步一步凝固为制度事实的。

三、裁量算式：受损被换算为制度价值时的格式挤压

如果命名是铸象装置的第一道模具——将混沌的受灾生活赋形为可被制度识别的格式——那么算式就是第二道模具：它将已被赋形的受损进一步裁量、换算为一套可比较的数字。在某种意义上，算式是铸象过程的核心工序：它决定了哪些受损是被“算数”的，而那些不被算数的部分，即使已被命名看见，也无法转化为治理系统分配资源时的重量。

算式如何裁量

灾害统计最核心的操作，是将混乱而不可通约的受损转化为可比较的数字。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治理技术：稀缺的救助资源必须通过某种相对公平的尺度来分配，而数字似乎是唯一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灾害之间、同一灾害的不同受灾者之间做出比较的通用语言。

但数字从不只是记录。它同时裁量——裁定什么被计数，什么被量化为零，什么在换算过程中被挤压到无关紧要的余数里。

一栋被冲垮的钢筋混凝土楼房，可以按建筑面积和造价标准折算出精确的货币损失额。一栋被冲垮的、承载了四代人记忆的祖屋，在灾后评估表里同样只是一间“土木结构损毁间数”，赔付标准比城里的商品房低一个数量级。一个在洪水中失去独生子的母亲，她的痛苦不会单独出现在任何灾情简报上——在救助体系中，她被转化为“因灾死亡人员抚恤金申领表”上的一个申请编号。那些无法用货币衡量的哀伤、创伤与记忆，在追求客观可比的灾害统计中，被系统性地裁量到了算式的可见范围之外。

算式格式的制度根源：它如何被铸成这副模样

这一套裁量逻辑并非源于统计者的冷漠，也不是某个掌权者一时兴起的偏好。它是被铸造出来的——在特定制度土壤中，经由不同力量之间的扭打与妥协，最终被铸成了今天这副坚硬的面孔。

“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在全球灾害评估中都占据着无可撼动的王座？这不是因为它最完整地描摹了受灾者的苦难，而是因为它最适配官僚体系的问责格式。在现代国家的财政-问责体制中，上级政府向下级拨付灾害救助资金时，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回应审计问询的“硬”依据。“这笔钱为什么拨给A县而不是B县？”“A县的受灾程度凭什么比B县严重？”——这些来自审计部门、人大乃至社会的追问，要求决策者拿出的不是一个关于谁更痛苦的叙事，而是一套可比较、可追溯、可核对的数字。在跨部门的格式压力下，“直接经济损失”被筛选为最具操作性的指标：它可以将房屋倒塌、农作物绝收、基础设施损毁这些彼此不可通约的受损，统一换算为货币尺度；一旦换算为货币，不同地区、不同灾种之间的比较就成为可能；而货币化的数字便于归档、审计与追责，在官僚体系内部引发的责任纠纷最小。

“直接经济损失”这副样子，不是因为它忠实地描摹了受灾者的苦难——恰恰相反，它之所以长成这副样子，是整个问责制度的格式要求挤压出来的。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更关键的生成机制追问是：在制度演化中，这套“必须用货币数字来回应审计追问”的格式，是如何一步一步挤掉了其他可能的受损表达方式的？

本文追溯这个演化过程时注意到，在中国的灾害统计制度史上，至少存在过三种相互竞争的受损评估理念。第一种是以受灾人口为核心的需求评估——直接统计“多少人没房住、多少人没粮吃、多少人需要医疗救助”，以人道主义需求为尺度分配资源。这一理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救灾实践中曾占据主导，彼时的灾情报告往往以“受灾群众生活安排”为叙事核心。第二种是在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中推行的综合脆弱性评估——不仅看经济损失，还看受灾者的社会网络断裂、心理创伤、未来生计恢复能力等非货币指标。第三种，就是最终胜出的“直接经济损失”主导模式。

第三种凭什么胜出？关键的一役发生在政府审计制度强化与行政问责制建立的历史交叉点上。在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日益受到审计监督的严格约束。地方政府在申请救灾资金时，需要向上一级财政和审计部门证明“这笔钱花得合理”。在这个压力下，基层民政部门逐渐发现：以受灾人口为单位的“需求叙事”，在审计面前是脆弱的——“你怎么证明这些人口确实受灾了？”“你怎么证明他们的需求就是这个数量级？”而货币化的经济损失数字，附着着可核查的评估标准、可追溯的工程鉴定、可核算的赔付单价，在审计系统的格式中显得“硬”得多。需求的叙事被审计的格式打败了。不是因为它不真实，而是因为它不够硬。而在官僚体系的生存逻辑里，硬——意味着可免责——总是优先于真。

另一条演化脉络来自灾害统计技术的自身锁定。房屋倒塌的“间数”、农作物的“绝收面积”、基础设施的“损毁里程”——这一套统计口径在几十年的使用中被固化进了从村到中央的灾情上报系统。每一级政府都在根据这套口径培训自己的统计人员、配置自己的信息软件、建立自己的考核指标体系。一旦一套格式在制度机器中扎根得足够深，改变它的成本就高到了任何单个部门都不愿承担的地步。于是，不是某个掌权者下令“不许评估心理创伤”——而是整套信息采集系统从设计之初就没有为之预留栏目，而改动系统的制度成本已经锁死了任何改革的可能性。

算式作为第二道窄门

这产生了一个深层颠倒。灾害指标的设定，本意是为了更公平地分配救助资源。然而，在算式统治一切的体系里，一个受灾者能否得到救助，不再仅取决于他是否受灾，而取决于他的受损能否被那一套特定的算式成功裁量为合格数字。算式从服务的工具变成了主人的门槛。它不再服务于“谁需要帮助”的判断，而是反过来决定着“谁有资格被视为合格的受害者”。

在这种颠倒中，算式自身成为了铸象装置的第二道窄门。受损通过了命名的赋形，还必须接受算式的再度裁量——在换算为制度价值的过程中，那些不可量化的部分被挤压殆尽，那些不合格的部分被四舍五入为零。在铸象装置的整套工序中，算式是那个最客观、因而也最不留情面的执行者：它不否认受损的存在，它只是让它不算数。

不过，真实世界里的救灾现场从来不是完全被这套硬算式统治的。那些在基层工作了几十年的民政助理们，早已发展出一套半公开的变通智慧。当表格格式无法容纳某种受损时，他们有时会把它“翻译”成表格能读懂的格式——比如，把一户没有房产证的受灾者的损失，合并到另一户有房产证的亲戚名下一起上报；或者，将一笔无法归入任何栏目的救助需求，以“特殊困难补助”的名义从另一笔更宽泛的经费中支出。这些地下翻译，在局部缓解了算式的僵硬。但它们的代价同样沉重：它们是个案式的、依赖于基层官员个人善意与胆量的，无法在制度层面改变算式的格式本身。更根本的是，这些变通本身反过来加固了算式的合法性——“表格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些没被表格覆盖到的个案”——从而将格式本身的暴力掩盖得更加深沉。

四、封口道理：程序表演如何注销结构性追问

当受损被命名为某种格式（赋形），被裁量为某种可比较的数字（裁量），铸象装置的第三道工序随即启动：道理的封口。道理是对灾害成因的指认。它从灾情发生的第一刻起就卷入铸象的合谋——它对责任的去向提供着极具操作力的地图，并最终完成铸象过程的封闭：通过一种特定的叙事格式，将灾害的发生原因锁定在某个闭合区间内，注销进一步追问的资格。

天灾与人祸：二元格式的局限

最古老的灾害叙事是“天灾论”：风雨雷电是自然界的自行运作，是一种超越人类控制与责任归属的不可抗力。它有一个极隐蔽的制度后果：当灾难被锚定在“不可抗力”范畴内时，对制度设计、审批决策或权力失灵的追溯，就被挡在了合法追问的门外。与之针锋相对的“人祸论”叙事则翻转了整个事件的道德坐标系：受灾者从“不幸的受难者”变为“被失职所伤害的受害者”；权力者则从“共同承受不幸的同胞”变为“可能负有责任的过失方”。

但在现实的制度操作中，最有效的灾害道理极少是粗线条的“这是天灾，无人有责”，也不是慷慨的“彻查到底，绝不姑息”。真正的道理战场，发生在二者的模糊地带——在那里，一种更精致的叙事类型被反复运用，它的功能不是分辨天灾与人祸，而是通过一场精心编排的程序表演，将二者之间的追问空间彻底封死。

程序化封口：当代铸象装置的关闭技艺

以华北那场二零一六年暴雨为例。灾后第五天，由当地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发布了初步通报。通报首先将此次暴雨定性为“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水事件”，指出小时降雨量“突破自一九五一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并在多处使用“突发性”“叠加效应”等高频率气象描述语——这部分话语承担着“天灾”的定位功能。与此同时，通报又承认“城市排水系统在应对极端天气时暴露出局部能力不足”，明确指出某段箱涵因“周边施工遗留的沉积物”造成过流断面缩减，并宣布对两名现场负责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这部分话语在履行“人祸”的追责职能。

关键在于两种说法分别讲了什么，而在于它们被如何组合。通报通过承认“局部、偶发、操作层面”的失误，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完成了对“人祸”成分的吸纳与消化。然后，更具决定性的是结尾那段话：“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句措辞在语用功能上起到了一组极其精确的闭合动作：它预先承认了错误，并斩钉截铁地宣告了纠正的决心，从而使任何继续追问“排水系统规划的根本缺陷是什么”或“为什么这套制度年复一年地生产同类失误”的声音，看上去像是在交织一个已经被妥善处置完毕的问题。

同样的叙事结构——我们称之为程序化封口——并非一次性的修辞事故，而是在不同灾种、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灾害调查报告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制度性叙事格式。本文作者曾对比过多份不同省份的洪涝灾害调查报告，发现在措辞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家族相似性：开篇必定首先建立“极端气象条件”的天灾底座；中段必定会承认若干“局部管理疏漏”并配以具体责任人处分；结尾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深刻汲取教训”等强烈的闭合措辞。这些措辞的重复出现，本身即表明它们并非某位报告执笔人的个人文风，而是一种被深度制度化的叙事技术——一个在行政系统内部被反复演练、传承、且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文本格式。

责任被正式确认，相关人员被处理，教训被汲取——整套程序圆满走完。然后，制度不动如山。

道理的封口功能

这种叙事不只是“天灾论”对“人祸论”的胜利，也不是二者的朴素混合。它是一种被深深制度化的新型铸象关闭技艺：通过纳入并表演追责，来系统性地注销对真正结构性问题的追问资格。调查结束了，责任被“处理”了，制度的根基毫发无伤。

这套程序化封口的道理，是铸象装置的最后一道工序。它的功能不是解释灾害的成因，而是完成铸象过程的封闭：用一场精心编排的追责表演，生产出一个“此事已被严肃处理、理应画上句号”的制度叙事，从而在结构上彻底闭合受灾者的受损本可以转化为制度变革推动力的那条通道。铸象过程至此完成闭环：受损被赋形（获得了“城市内涝灾害”的模样）、被裁量（被换算为合格数字）、被封口（被锁定在一个“已处理完毕”的责任叙事中）——它在治理系统里的真实样貌就此凝固，不容再被打开。

五、同一次暴雨，两种铸象：一道门槛如何铸造出两种命运

命名、算式和道理并非按先后顺序依次登场的独立工序。它们是铸象装置上三套互相嵌合的模具，在暴雨发生后的数小时到数天内，被同时搅进同一口锅里，互相借力、互相掣肘、互相加固。正是在这场三方合铸的扭打中，同一场暴雨被铸造出对不同人群的截然不同的制度面孔。本节将以华北那场暴雨为叙事锚点，具体展示在这场雨中，两个群体的受损如何在铸象的门槛前分道扬镳——一个成功地被铸入公共之灾，另一个则在格式的窄门前败下阵来，最终被铸成了无人负责的私人厄运。

成功铸入者：中产社区如何成为合格的“灾”

暴雨落下后，城市北部某中产社区的居民很快展开了行动。被淹车辆的车主在第一时间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保险公司的定损体系要求的是车牌号、保单号和现场照片，这些都是一个城市中产能够瞬间提供的格式。物业公司打开了地下车库的排水泵，并在当天晚间向所属街道办提交了一份“小区地下车库进水情况说明”——一份带着社区公章、注明积水深度和受损车辆数量的格式化文书。到了第二天清晨，这份说明已经被街道办汇总到了区应急管理局，成为灾情统计表中“城市积水情况”一栏的数据来源之一。

在命名的环节，这个社区的受损拥有全部必需的格式要素。受损的主体是“户”——有房产证的业主、有车牌号的车辆所有者、有工商登记的物业公司，每一个受损都可以被精确地锚定在一个制度坐标上。受损的类型是“财产损失”——这是一个可以被保险定损公式、建设造价标准和市场评估价格共同覆盖的受损类别，在灾害统计表格上有专门的一栏等着它。受损的证据是“格式化的”——保险公司拍照定损有一套标准化的取证流程，物业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遵循的是基层应急管理的固定模板。受损从暴雨落下的那一刻起，就天然地长成了铸象装置能够完美识别的模样。

在算式的环节，这个社区的受损进一步被成功裁量。进水车辆的损失被换算为保险赔付额；地下车库的清理修复被换算为物业管理费的增量支出；小区围墙的倒塌被换算为市政维修工程的造价估算。每一笔受损都可以被精确地裁量为一个数字，每一个数字都可以被安放进灾情统计表上预设的栏目里。当这些数字被逐级汇总，它们构成了证明此次暴雨“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硬证据，并触发了上级财政救助的响应程序。

在道理的环节，这个社区的受损被锁定在了“城市内涝灾害”的叙事框架内。这一框架使得事件的责任自然地指向了市政排水系统的设计与管理——一个可以被问责、被整改、被投入资源的制度环节。当地媒体在报道中使用的叙事是“考验城市排水系统”和“市政官员被要求说明情况”——这些叙事将受灾者定位为公共服务的合格消费者，他们的受损是公共系统失灵的后果，理应得到公共资源的回应。调查通报中“局部管理疏漏”的表述与对相关责任人的处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叙事：此事已有人负责，制度已做出回应，受灾者是制度保护的正当对象。

整个过程顺畅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铸象装置的存在。不是因为这些居民的受损比农田里那些农民更“真实”或更“严重”，而是因为他们的受损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从车库进水的那一刻起——就穿着铸象装置能够完美识别的全套格式外衣。

被铸出者：城乡结合部的毁灭如何沦为私人厄运

在同一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同一场暴雨砸出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这里没有物业管理公司，没有格式化的灾情报告模板，没有可以快速拨通的报案电话。这里住着的人——外地来的建筑工人、在批发市场蹬三轮的搬运工、带着孩子在城中村租房的年轻母亲——他们的受损，从暴雨落下的那一刻起，就穿着一身铸象装置无法识别的外衣。

那位屋顶被掀掉的五十岁建筑工人，我们已经在第二节中见过他的困境。他没有本地户籍，没有房产证，独自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自建房里。台风过境，屋顶被掀掉。他的受损没有“户”可以作为制度承载体——他在灾害统计表格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可被填写的格子。他无法报案——保险公司需要的是保单和产权证明。他无法向街道办提交情况说明——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家有资质的物业公司。他的受损，在最基础的识别环节——命名的环节——就无法被赋形。

在算式的环节，他的困境进一步恶化。即使假定他的受损已经被某个基层工作人员手动“翻译”进了表格——比如，被并入到房东的名下——那么接下来的裁量逻辑会给他带来新一轮的挤压。他租住的自建房，在评估标准中属于“简易结构”，赔付单价远低于城市商品房。他屋内被淹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由于没有正式发票，在评估中需要被折旧折算，最终得出来的数字可能低到连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而那些不可量化的受损——他花了一周才重新找到住处，期间失去了三天的工钱；他的孩子因为家里被淹在同学面前感到羞耻——这些受损在算式的表格中根本没有可以安放的栏目。

而在道理的环节，他连进入封口叙事的资格都没有。暴雨过后，没有任何一份通报会去调查“为什么一个建筑工人的屋顶会被掀掉”——因为他的受损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灾害”的制度之象。没有名字，没有数字，因而也没有需要为之负责的责任链条。他的毁灭，在政府的灾情总结报告里，不存在。不是被低估、被淡化，而是根本不存在。它被铸出了公共之灾的边界，落入了那个巨大的、无人为之负责的私人厄运的范畴。

铸象的分界线

两个群体，同一场暴雨。前者受损的格式完美地匹配了铸象装置的要求——受损者是有制度坐标的“户”，受损类型是财产损失，证据是格式化的，因此他们顺利地穿越了赋形、裁量、封口三道窄门，被铸入了公共之灾的制度之象。后者受损的格式从第一刻起就无法被这套装置识别——没有“户”、没有产权、没有格式化证据——因此他的受损在铸象的门槛上就败下阵来，连被铸入公共之灾的资格都没有。

这条分界线不是在救助物资分配的环节才划下的。它是在受损第一次接触到制度真实的那一刻——在某个基层工作人员面对表格犹豫着写下“0间”的那一刻——就被命名、算式、道理三套模具联手铸造出来的。铸象装置铸造出的，不仅是灾害的制度面孔，还有那些在这副面孔上看不到自身倒影的人——他们的毁灭，在治理系统的眼睛里，不是灾害。它是私人厄运。

六、反驳与回应

本文的核心判断——受灾者的受损是被铸象装置铸造为制度之象，而非被制度“发现”的现成事实——必然会遭遇来自多个方向的严肃反驳。将其中最具威胁性的几个挑战前置并认真回应，是确立论证分量的必要步骤。

反驳一：极端物理强度能否跳过铸象？

最具威胁性的反驳来自一个朴素的直觉：如果铸象装置真的完全决定了“灾”的生成，那么一场七级地震的破坏力，难道会因为叫它什么名字、被统计为怎样的死亡数字、被安放在何种责任叙事中而减轻或加重吗？是否存在一种物理强制——极端强度的自然暴力——能够直接越过一切铸象模具，强行确立自身为“灾”？

这个挑战是准确的。我们完全不否认，在物理暴力足够极端的条件下，铸象装置的筛选作用会被大幅压缩。一场摧毁整个城市的七级地震，其灾害的制度真实之确立，确实不需要围绕命名格式展开旷日持久的争夺——物理世界的毁灭过于彻底，以至于任何制度机器都不得以最高级别响应。

但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分析框架失效。相反，它帮助我们精确地标定了该分析框架的有效边界。铸象的格式筛选作用，恰恰是在那些物理强度没有那么极端的、占绝大多数的“中等灾害”中，才最为触目、最不平等地运作着。而即使是七级地震，在其物理暴力强行闯入“重大灾害”序列之后——铸象装置仍然在其内部的分配排序中发挥着作用。为什么是某某城区的废墟率先被清理？为什么某支救援队优先搜寻了某某小区？为什么某项损害赔偿标准在此而非彼？这些差别，已经不再是“是不是灾”的铸象差别，而是“是什么样的灾、对谁是灾”的铸象差别。三元模具依然在运作，只是在物理暴力的压倒性存在面前，它们退入了更细微的操作缝隙之中。

反驳二：受灾者的反抗能否打破铸象？

另一个不容回避的挑战来自对受灾者主体性的辩护。这一批评会说：在你笔下的叙事里，受灾者几乎总是被铸象的被动客体。他们的反抗呢？他们自己的那套民间命名、民间算账、民间道理呢？如果受灾者自己也在积极地为自己的受损争取制度承认——如果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也在“铸象”——那么，制度铸象与民间反铸象之间的扭打，才是灾害生成的完整图景。你只讲了半幅图景。

这个批评是精准的，而且坦白地说，它戳中了本文初稿最大的盲区。在受灾者身上，确实活跃着一套与官方完全不同的铸象对抗行动。他们有自己的命名——不是“城市内涝”，而是“咱家被淹了”。他们有自己的算账——不是“直接经济损失”，而是“娃明年学费咋办”“这一季的收成全没了，来年种子钱从哪出”。他们有自己的道理——不是“历史罕见极端天气”，而是一个简单、直接、毫不含糊的判断：“他们早就知道这堤会垮。”“这条排水沟，去年就说要修，修到哪去了？”

这些民间铸象反击，是受灾者在制度的齿轮间撬开缝隙、争取承认的日常实践。本文无意否认它们的存在和力量。事实上，在完整的铸象理论图景中，制度铸象从来不是在一个真空中顺畅运转的。它总是在面对——在对抗、吸纳、压制或妥协于——来自受灾者的民间铸象反击。那些被铸出公共之灾的群体，并不会沉默地接受“私人厄运”这个标签。他们会请愿、会上访、会找媒体、会写血书。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尽管常常是弱勢的、缺乏制度杠杆的方式——试图让自己的受损冲破铸象的模具，被公共世界看见。

但本文的分析焦点选择集中在对官方铸象装置的解剖上，这并非因为它否认民间对抗的存在，而是因为它要回答的是一个特定的、此前未被充分回答的问题：那套凌驾在受灾者头顶上的、由命名、算式和道理构成的制度铸模，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它的格式要求是什么？它的门槛卡在哪里？它的封口技术是怎么完成闭合的？这些问题，不是去讲一个“弱者如何反抗”的故事就能回答的——它需要研究者把镜头推进到铸象装置本身的内部，仔细去看它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标准、每一句措辞。

承认这一分析焦点选择并非软弱，而是诚实地划定本文的知识边界。未来的研究若以民族志方法完整记录受灾者如何用自己的赋形、算账和追责话语在制度模具间撬开缝隙——记录那些成功的反铸象案例，也记录那些被制度格式彻底碾碎的反抗——将是本文最急需的姊妹篇。那篇姊妹篇与本文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铸象斗争图景。

反驳三：铸象概念能否跨制度迁移？

第三个批评者可能会质问：你的分析聚焦于中国特定制度语境下的灾害治理，那么这套“铸象”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推及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语境？如果它在解释中国案例时有效，却在面对另一制度环境时失效，那么它是否只是一个区域研究，而非一个具有更广泛理论潜力的分析装置？

这个批评是有分量的，但它将分析的“适用边界”误认为“理论缺陷”。本文从未声称“铸象”是所有社会中灾害构成的普遍铁律。我们论证的是，在任何一个依赖国家行政体系来进行灾害识别、评估和响应的社会中——这涵盖了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命名”“算式”“道理”这三个铸象环节，必然以某种具体的形式在场。它们的具体格式——什么样的命名程序、什么样的统计口径、什么样的封口叙事——会因政治体制、法律传统和行政文化而异。但它们的在场性，源自现代国家治理“识别—计量—归责”这一基本制度架构本身。在这一意义上，铸象的分析装置是可迁移的，但需要每次在一个新的具体制度环境中经过重新校准才能落地。我们欢迎其他语境中的研究者，将这三重模具装入他们自己的制度土壤中，去检验哪些机制可以平移，哪些会在水土不服中被淘汰。

反驳四：如果铸象如此刚性，变革如何可能？

还应补上一个更具结构性的反驳。如果铸象装置如此刚性——命名要求格式、算式裁量价值、道理封口追问——那么这项研究的终点，难道只是告诉我们“水往低处流”吗？那些在暴雨中失去一切的农民和建筑工人，他们读了你的分析，得到的不过是一个更精致的绝望：看，你被一个叫铸象的东西压住了，这东西这么硬，认命吧。灾害治理的变革如何可能？

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伦理追问。本文给出的不是认命的理由，而是变革的地图。因为“铸象”这个概念本身，就把变革的靶子从前端的救助分配，挪到了更根本的铸象门槛上。传统的灾害研究在讨论“减少不平等”时，给出的方案往往是：增加救助资金、优化分配公式、加强监督。这些方案都在接受铸象结果的前提下工作——它们设法把已经铸好的公共之灾中的资源分得更公平一些，但对那些被铸出为私人厄运的毁灭，它们什么都没做。

铸象的分析告诉我们：真正的变革，必须发生在更前端的环节。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改变命名程序中的格式要求——什么样的受损可以被承认为合格的灾情？它意味着改变算式设计中的价值排序——那些不可量化的创伤，能不能有一个栏目？它意味着改变封口道理的方向——灾害调查能不能不只是为了封口，而是为了撬开制度变革的入口？它还意味着——这一条更关键——让那些被排斥在铸象格式之外的群体，拥有进入格式重构过程的发言权。

这些不是空泛的理想，而是有具体操作路径的制度变革方向。在历史上，每一次灾害治理格式的重大变迁——从以“户”为单位的救济到以“人”为单位的救助，从单纯的物质补偿到综合的生计恢复——都不是在平静中自动发生的。它们是在受灾者的抗争、媒体的持续追问、制度的内部危机、以及政治结构的变迁共同作用之下，被锻压出来的。铸象装置的模具不是永恒的，它只是在等待下一次足够大的缝隙。

七、结论：铸象，以及这个判断会在什么条件下失效

本文试图论证一个基本判断：灾害不仅仅是自然力量对社会的外在打击。受灾者的受损——那些被洪水冲垮的房屋、被淹没的庄稼、失去亲人的痛苦——在被制度识别之前，不是一种等待被准确反映的现成事实。它们必须穿越由命名、算式和道理三者联合构成的制度铸模，被铸造为一个合格的“灾害之象”，才能在这个治理系统里获得制度真实。命名是铸象的第一道模具：它将混沌的受灾生活赋形为制度可识别的格式——但恰恰是这种赋形所需的格式要求本身（必须有“户”作为承载体），将那些在制度坐标中没有固定位置的人，从一开始就排斥在了铸象过程之外。算式是铸象的第二道模具：它将已被赋形的受损进一步裁量为可比较的数字——但算式的格式本身就是官僚体系在“必须分配资源又必须免责”的压力下、在审计制度的挤压和技术惯性的锁定中，被历史地铸成的充满价值排序的妥协方案，它在换算过程中系统性地挤压甚至清零了那些不可量化的受损。道理是铸象的第三道模具：它将灾害的成因锁定在某个可管理的责任叙事区间内并完成封口——而最具当代迷惑性的封口形态，是通过一场程序化追责的表演来系统性地注销对结构性问题的追问资格。

三者不是分段接力，而是从暴雨落下的第一刻起就同时卷入同一场合铸。正是在这场铸造的扭打中，同一次暴雨被铸出了对不同人群的截然不同的制度面孔——将某些人的毁灭铸成了值得社会动员资源去回应的公共之灾，将另一些人的毁灭铸成了无人为之负责的私人厄运。灾害不平等的根本起源，不在救助物资分配的后端，而在受损被首次转化为制度真实的铸象门槛上。

本文的经验贡献在于，我们将灾害社会学长久以来聚焦于“灾害后果”的分析视角，前推到了“灾害构成”的环节——不是去解释谁在灾后恢复得更慢，而是去追问谁的毁灭首先被铸入了这个治理系统所承认的“灾害”格式之中。通过引入公开制度材料、机制性综合案例和具体的对比分析，本文进一步展示了铸象门槛如何在同一次暴雨中实际运作——不只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在具体的表格、措辞和行政决定中，一刀一刀地划出公共之灾与私人厄运之间的分界线。

本文的理论贡献则在于命名了一个此前“看得见却说不出”的现象，并在与诸多理论近邻的严肃对质中，钉死了它不可还原的理论收益：铸象——受损在制度真实中获得存在的那个门槛过程，不是被动记录而是主动铸造。它与规训权力分享了“制度主动生产真实”的基本洞见，但它做的事情比规训更早：它不是在塑造已被识别的主体的认知与惯习，而是在第一个制度性的检验关口上，决定谁有资格成为被规训的主体。它与那种关于符号暴力的分析传统揭示了相似的“不流血的暴力”机制，但它的核心操作不是使受害者合谋于自身的被支配，而是通过程序化封口——调查、通报、处分、闭环——在制度程序的层面注销追问的资格，而不必征服人心。它与国家理论中对“格式化”的经典剖析之间既有传承也有推进：它同样揭示了国家通过格式之网去“看”世界的根本机制，但它进一步指出，在灾害这个特定情境下，格式不只是简化的工具，更是真实性的门槛——在铸象完成之前，受损用这套制度的眼睛看，根本就没发生过。

学术研究有其诚实的边界。本文集中分析了作为支配方的官方铸象装置，却没有以同样的篇幅去追踪受灾者如何通过自己的民间赋形、算账和追责实践，在制度模具的齿轮间撬开缝隙、争取承认。那不是因为它不存在，恰恰相反，是本文的问题意识聚焦于支配机制。这一选择是分析的需要，却构成了一份需要未来研究来填补的空白。此外，本文以中国城市暴雨为核心叙事线索，这意味着铸象装置在其他政治体制和文化语境下的具体格式与工序，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检验。但我们相信，只要现代国家的灾害治理仍然依赖“识别—计量—归责”这一套基本制度架构，本文的分析装置就拥有被迁移和调试的潜力。

最后，我们给出这个判断的证伪条件。如果未来有一天，一个社区的灾害救助资金分配不再以受灾者是否能够被成功铸入一个事先设

定的统计名目为前提——也就是说，受损本身的出现，而不是受损在既定表格里被铸成的精确格式，构成了触达救助的充分条件；如果那一天，地方官员不再需要为了让死亡数字低于某个令人恐惧的问责阈值而扣发那些被标注为“失联”的未确认条；如果那一天，灾害调查不再通过一场程序化追责的表演来注销更深层的结构性追问；如果那一天，那些在城中村失去屋顶的外来打工者和那些在安置点里等待DNA比对结果的失联者家属，能够不被表格的格式所筛选，而是带着他们受过的全部苦难，直接走进治理系统的真实——那么，本文关于“铸象在灾害构成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判断，就将失去它的解释力。这个判断的成立，依赖于它所描述的那套制度铸模依然在现实世界里有力地运转。如果有一天，这些模具被人的自主性行动和制度变革所松动甚至拆解，我们将乐于看到这个判断被现实驳倒。那将是一件比论文成立与否更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在那个时候，此刻这篇论文所努力描述的那台铸象装置，就终于第一次在暴雨之中停转了。

材料说明

本文的“二〇一六年华北某市暴雨”是机制性综合案例，参考我国公开灾情统计制度、灾害调查报告和城市暴雨治理中的常见程序构造，不对应某一可识别城市、会议、工作人员访谈或原始档案。作者未开展所述会商现场的田野调查。

文中对表格、命名、算式和追责话语的描写用于提出可检验的理论命题；只有脚注和参考文献明确支持的制度事实可以作为经验材料单独引用。

参考文献

[1] 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Risk Analysis, 1988, 8(2): 177–187. DOI: 10.1111/j.1539-6924.1988.tb01168.x.

[2] Douglas M, Wildavsky A.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3]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4]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5] Scott J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 Boltanski L, Chiapello È.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M]. London: Verso, 2005.

[7] Tierney K. The Social Roots of Risk: Producing Disasters, Promoting Resilienc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应急管理部. 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R/OL]. 2024.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403/W020240318718425077200.pdf>.

[9] 国务院灾害调查组. 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R/OL]. 2022. <https://www.mem.gov.cn/gk/sgcc/tbzdsgdcbg/202201/P020220121639049697767.pdf>.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证伪条件的重写

正文的证伪条件是一串“如果那一天……”的排比：如果救助不再以能否铸入统计名目为前提、如果官员不再扣发失联条、如果调查不再表演式追责。这些描述的是机制停止运转的情形，属于适用范围条件，而非可被数据触发的证伪——机制停转时理论停用，这对任何机制性理论都成立，因而不构成风险。可触发的版本是：在同一场灾害内部，比较不同受损类型的格式匹配度与其获得制度救助的比率。若二者不相关，或相关性可被受损严重程度完全解释，则铸象不构成独立的门槛机制。这一版本把赌注押在同一场灾害的内部差异上，无需等待制度变革。

增补二：格式匹配度的可编码形式

格式匹配度定义为一次受损被现行统计名目直接容纳的程度，可分四级编码：有专门名目且有对应计量单位；有名目但需换算；仅可归入残余名目；无可归入名目。编码对象是受损进入系统时的原始描述与名目表的对照，不是最终认定结果，以避免用结果解释结果。三个核心机制由此各得指标：赋形命名对应编码级别，裁量算式对应换算过程中的量值损失比，封口道理对应结构性追问在程序文本中被终止的节点位置。

增补三：与国家格式化的边界收紧

斯科特的可读性论证国家为便于管理而简化社会现实，其代价是地方性知识被抹除。本文与之最易混淆，也必须切得最细。可读性关心的是国家如何看见一个社会以便治理它，是一种事前的、面向全域的简化；铸象关心的是一次已经发生的受损如何在事后被压入格式才获得制度存在，是一道事后的、逐案的准入门槛。前者的失败形态是治理不当，后者的失败形态是不被承认。判别面在此：一个高度可读的社会同样可以有大量受损铸不进名目——可读性解释不了同一场暴雨内部的分道扬镳，铸象可以。

增补四：与作者已发表工作的分野

作者已发表的《信任的盐碱化》与《制度代偿的悖论》追踪的是制度对关系性条件的侵蚀，其分析位置在制度与个体的长期互动中。本文的分析位置是一个远为狭窄的时刻：受损第一次被制度识别的那道门槛。这个时刻此前在作者自己的工作序列中未被单独处理过，也是本文的独立贡献所在。相应的限界是：本文不追踪铸象之后的救助分配与恢复过程，那需要另一套分析装置。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eoffrey C. Bowker & Susan Leigh Star,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MIT Press, 1999.

Pierre Bourdieu,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Fayard, 1982.

Roger E. Kasper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2), 1988.

Mary Douglas & Aaron 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